

中国红：文化符号与色彩象征

○吴保和 魏燕玲

摘 要 尚红习俗的产生和趋热，体现了中国色彩象征漫长的转换历史、深厚的文化内容和丰富的心理意蕴。本文通过对中国色彩崇尚历史演变的梳理，对红色象征的政治和艺术分析，探寻了中国红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民族心理和社会原因，提出了“中国红”的三个重要来源，即民俗传统、革命潮流和国家意识，以及中国红对当代中国的象征意义、文化表达与商业价值。

关键词 中国红 文化符号 五色 民俗 革命 国家意识

马克思说过：“色彩是反映一个民族性格最直观的方式”。比如阿拉伯人崇尚白色和绿色，蒙古民族崇尚白色和蓝色，中国西南地区的彝族崇尚黑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崇尚白色。在当代中国，如果要找出一种最能代表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图腾的色彩，也许大多数中国人会选择红色。这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红色是喜庆、吉祥、生命、欢乐、正义、胜利的象征，是许多中国人在色彩选择时的首选，因为，红色最能代表中国的乐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入世情结，最能象征中国人热衷于营造欢乐喜庆气氛的民族性格和趋吉避凶的民族心理。“中国红”丰富的文化内涵，深远的精神寓意，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中国红”一种恒久钟爱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反映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也反映在建筑、戏剧、影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包、无处不在。

中华民族一度崇尚黑色，也一度崇尚黄色，为何却是红色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获得民族集体的文化认同，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与精神的色彩象征，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民族与国家文化符号，正是本文所想探讨的问题。本文运用

通过中国色彩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与色彩心理学的原理，分析红色从民间风俗、政治寓意到时尚指标等表征背后的心理脉络，追寻“中国红”产生的历史原因与民族心理的关系，并探讨“中国红”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象征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概念：何谓“中国红”？

中国红（英文为 china red）是近年来中国文化中较频繁出现的一个名词。有人考证这个名词的由来时认为，它原是出于对一种颜料的称谓，亦即一种产自中国的优质朱红颜料，这种颜料的成分辰砂（Cinnabar）来自中国，由于用这种颜料烧制出来的陶瓷品形成的色彩非常鲜艳温润，为人们所喜爱，因此西方人有时也将优质朱红颜料称之为“中国红”^①。也有人认为它指代的是一种瓷器，由于 china 在英文中亦可译为瓷器，因此“china red”即是“红色瓷器”之意，指的是明代宣德年间江西景德镇烧制出的一种供皇家专用的鲜红瓷器，名为“祭红”。

而近年来，人们对于这一名词的使用远远超出了材料和器物的范畴，而跃升至文化层面，将它作为中国文化或中国形象代表的一种色彩，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报道、学者文章、艺术创作、工艺设计之中，论者们纷纷以赞美的笔调、自豪的心情，将这一色彩描绘为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文化的象征。那么，何谓“中国红”？为了厘清概念，我们不得不溯本追源，从问题的原点谈起。

虽然大自然中各类景物的色彩丰富多样，但由于人类肉眼只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感光体，因此所见的色彩空间通常可以由三种基本色所表达，这三种颜色被称为“三原色”，指不能透过其他颜色的混合调配而得出。三原色有两种说法，在

电视机、监视器等主动发光的产品中，三原色是红、绿、蓝。这三种光以相同的比例混合、且达到一定的强度，就呈现白色（白光）；若三种光的强度均为零，就是黑色（黑暗）。这就是加色法原理。在打印、印刷、油漆、绘画等靠介质表面的反射被动发光的场合，三原色是品红、黄、青。由于物体所呈现的颜色是光源中被颜料吸收后所剩余的部分，所以叫做减色法原理。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原理，红色都是原色或基本色。但是在大自然中，由于天然物质都含有杂质，所以没有纯粹的、原色意义上的红，因而在中国民间的实际使用中，往往取某些红色的天然物质来命名红色，如石榴红、樱桃红、玫瑰红、枣红、桔红、酒红、铁锈红、胭脂红、朱砂红等。在使用染料和颜料时，人们通常把其中最为纯粹和明艳的、接近于原色的红颜料称之为绛红。这种红色可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共产党党旗等制作，因而这种颜色具有某种权威地位和官方身份，常常被人称之为“中国红”。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红”说法的流行，在许多重要场合使用的红色往往被称为“中国红”，如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红”瓷作为国礼赠送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的团服，其主色调即是以红色为主配以黄白两色，2008年北京奥运会推出的“奥运瓷·中国红”礼品瓷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墙体则以七种程度不同的红色，通过不同色度的渐变，实现了整体的“中国红”表现等^②，都是运用红色来代表中国的例子。此外，如人们喜爱的编织物中国结，春节时人们所穿的唐装、旗袍，结婚时新郎新娘所穿的婚装婚纱，贺喜送礼用的红包，化妆品和装饰品的口红、手镯、胸针、领结，张贴在门上的对联、“福”字，传统的手工艺剪纸，甚至某些商品的名称和外包装设计，如中华烟、西凤酒等。在这些例子中，各方使用的红色并不完全相同，代表的也并非都是国家，但都自称为是“中国红”，如果这些说法都成立的话，那么，在色彩本身的意义上，“中国红”应该不是一种特定的红色，而应当是以国旗红色为核心的一组红色色彩系列。本文将以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展开论述。

二、尚红的民俗：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红色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红”，与中国的历史生活和民族心理有关，并与千百年来中国人重视

生命、追求俗世的民族性格和乐感文化有关，这是中国红能够成为中国代表色的民族心理基础。

最早从心理对红色产生崇拜的是原始民族，其来源是对于太阳、火、血的崇拜。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说法，原始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基础，以神秘的互渗律为特征的一种特殊的思维类型。这种原始思维特点使得原始民族在对世界的认知中，是以生命本能和人体感觉来对事物进行认知，往往直接从事物本身引申出颜色的意义。以太阳为例，它不仅带来光明和温暖，太阳促使万物生长，而且日出日落的景象，在原始先民看来意味着某种神秘力量。原始人对火的崇拜也同样，由于火能够带来温暖，煮熟食物，驱避猛兽。但同时也能烧死人，因此在古人眼里，火是一种奇异的特殊物质，被视为天神之物。对火这种神秘力量惊异与喜爱，原始民族往往对火产生崇拜心理，甚至直接将火作为神明来崇拜，如古代波斯的拜火教就是这样。直到今日，还有许多民族保留着对“火神爷”的崇拜习俗。如中国民间农历腊月二十三的灶神节，就是祭拜灶神也即是祭拜火神。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相传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就是炎帝，而太阳鸟则是他的化身，因此古人不仅将炎帝作为祖先来祭祀，也是作为火神来崇拜。所以说，对于太阳和火的崇拜不仅产生于中国原始时代的原始心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渗透进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并与人间的祖先和帝王有了某种联系。

如果说原始民族对太阳、火的崇拜与敬畏自然力量有关，那么对血的崇拜则与敬畏先人和生命有关，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原始人就明白生命与血液紧密相联，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各民族历史中都出现过，比如在希伯来语中“血”和“红”这两个词是同源的。在爱斯基摩语中，“红色”从字面上直译过来是“像血一样”。在非洲、南美等地的土著民族，红色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他们在死者的遗体上涂上红色，以祈祷死者得到永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墓穴里，死者遗骨的周围有用赤铁矿粉撒成的圆圈。学界认为，红色的赤铁矿粉应该是被古人视作鲜血的象征，在死者周围撒赤铁矿粉，其意是为死者祈求新的生命。而原始部落和某些民族的“血祭”仪式，正是将动物或人的血作为最重要祭品奉献给上苍、神灵、祖先或某种神秘力量，这种仪式在进行祭祀时要当场屠杀以让鲜血喷出或流溅。古人缔结

盟约对天发誓时，盟誓双方要饮牲口血或以血涂口旁，以生命表示郑重的承诺。由于红色的太阳、红色的火、红色的血都与生命有关，在原始认知思维中会产生一种泛化的意义表象，因此崇日、拜火、崇尚生命的心理带来了对于这些事物的色彩属性——红色的偏好心理，并进一步转化为对红色的崇拜。基于血的这种心理和象征性意义的使用，红色也成为了代表所有生命情感中正面的主导颜色^③。以代表“牺牲”的本意延伸开去，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在人间日常生活与政治原则中，就与即使牺牲个人的利益或生命，也要捍卫某种原则的正义、忠诚等良好品质联系到了一起，如歌颂忠臣的成语“碧血丹心”、褒奖正义之士的“赤胆忠心”、“披肝沥胆”、“赤子之心”等词语。在中国京剧脸谱中用红色来表示耿直、忠义，象征着权力、坚定和吉祥，大多用于富有血性的人物。如涂红色脸谱的关羽就是忠正勇猛之士。血作为生命力的象征这一点仍然延续至今。

如果说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有过原始的红色崇拜，那么，对红色的喜爱还与中国的民俗心理和现实生活有关，从中国民间对红色的应用看，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辟邪，趋吉避凶，这来自古代驱逐猛兽的传统；二是喜庆，全都与婚姻和生育有关。

在民间习俗中，将红色看成吉祥的象征首先是源自于对红色功能的信仰。在原始时代，古人从现实生活环境意识到红色的篝火可以防止野兽的袭击，红色的太阳带来温暖和光明，因而“红色”给幼年的人类一种超自然的能量和精神上的支持，并进而发展出其“辟邪”的功能。所以，为了躲避邪恶的力量和不祥的事物，就必须有红色的东西来“抵挡”或“镇”住这种力量，比如春节时中国人普遍使用红色来装点环境的习俗就与年兽的传说有关，这个传说证实了民间心理所信仰的红色辟邪功能^④。当代中国大陆许多人每当“本命年”这一年，就要在身上佩戴红色的物件，或穿红色的内裤，民间“跨火盆”的习俗等，其实都和重视相信红色的“辟邪”功能有关。

在中国民间，婚姻、生育这些与延续生命有关的事物中，红色都是最主要的色彩，而且越是红的数量多、红的面积大，则生命力就越旺盛，因为红色象征着生命。古代把男女确定婚姻关系互送信物或婚约称之为“传红”^⑤。把介绍男女相识和结合称为“牵红线”^⑥。旧式婚礼中除环

境装饰上挂红灯、贴红囍、点红蜡烛等满堂皆红外，新娘服饰都要穿红衣红裤，腰系红带，头顶红盖头，新郎必须披红，入洞房时要牵红巾。古称新婚之夜为洞房花烛夜，花烛是婚礼时用的绘有龙凤等彩饰的大红蜡烛。

在生育礼俗中，也有许多对红色的使用，比如得子的家庭要向人送红色喜蛋、如果自家媳妇迟迟未能生育，家人就要拿着红绳到送子娘娘庙“拴娃娃”，去刚生小孩的家里讨红鸡蛋等等。在这些生育习俗中，红色，其实是象征着生命的孕育和诞生，表达了一种生育崇拜和生命力向往。由于中国文化有重生命、重家庭、重子孙的传统、而红色代表着有生育能力、家庭人口众多“多子多福”，所以红色代表家庭的喜庆和圆满，成为喜庆和吉祥的象征。而红丝、红豆、红蛋、红帖等具体事物也就演变成带有社会化情感的色彩符号，对红色的喜爱和认定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和思维定势^⑦。

三、色彩与政治：王朝更替与色彩选择

虽然从历史到民间，都有中国人广泛崇尚红色的记载，然而红色却并非一直是中国人崇尚的色彩，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红、白、黑、青、黄都曾经成为过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崇尚色。而且，各代崇尚色虽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色彩崇尚与王朝更替有直接的联系，往往一个王朝被推翻或被更替，这个王朝崇尚的色彩也同时会被替换，如夏王朝崇尚青色，推翻夏的商就崇尚白色，商王朝被周推翻，周王朝崇尚色就成为了红色。之后不同王朝都有自己的崇尚色，如秦代尚黑，西汉尚黄，王莽新政时尚青，而东汉又尚红，曹魏尚黄，晋代尚白。南北朝时期的宋崇尚黑色，齐崇尚青色，梁崇尚青色，陈崇尚红色。到了隋代，再次崇尚红色，唐代崇尚黄色，宋代崇尚红色，元代崇尚白色，明代崇尚红色，清代崇尚黑色。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红色才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国家色”。因此可以说，政治的原因、政权的变更与统治者的选择是“中国红”说法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最早将色彩与政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始于秦朝。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始皇称帝后，除了统一文字、度量衡、刑律条令之外，也对衣冠服饰制度做了许多规定，其中之一就是色彩。秦始皇认为，既然秦朝取代了周朝，就意味着上天已经抛弃了周朝，周

朝也不再能承载天命，为了顺应天意，必须在各个方面体现秦取代周的天意。由于周朝属于火德，崇尚红色，而秦属于能够克火的水德。于是秦朝应该尚黑，黑色为贵。所以秦代的衣服、旗子主要都是黑色^⑧。

如果说，唐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是将某一种色彩作为朝代“主流色”的话，那么，将某一色彩作为皇家的“专用色”则始于唐代。唐代认为近似日头的赤黄之色是皇帝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色（赭黄色）除皇家外，臣民不得僭用。唐太宗时就规定，“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平民百姓不得以黄色为衣。只有皇帝才可以穿“黄袍”，于是，色彩进入了政治体系内，正式成为权位的象征。五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时，诸将给他披上黄袍，“黄袍加身”便意味着拥立他为一国之君，可见黄色在政治文化和一般百姓、军队将士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将黄色与君王权力相联系的做法也为宋以后的历代君王所继承。如明清两朝以“明黄色”为帝王专用色，帝王所穿的服饰、王朝所用的旗帜、记载皇上喻示的圣旨、包扎代表朝廷权力官印用的织物都是黄色的。

从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看，中国古代曾先后崇尚过黑、红、青、白、黄五种颜色。这五种颜色被儒家视为“正色”。按东汉经学家刘熙在《释名》卷四中的解释是：“青，生也，象物生时之色也。赤，赫也，太阳之色也。黄，晃也，晃晃日光之色也。白，启也，如冰启时之色也。黑，晦也，如晦冥之色也。”这五种颜色不仅与“天”有关，也与“地”有关。即黄色为土，象征中央；青色为木，象征东方；红色为火，象征南方；白色为金，象征西方；黑色为水，象征北方。比如北京天坛就是按照这种理念布置的。天坛之一的社稷坛用五种颜色的土壤填满：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心是黄土。在每年春分前后，皇帝要率文武百官，捧着盛有五色土的祭盘登坛跪拜，祈求土地神和谷神保佑农事顺利、五谷丰登。每当诸侯受封时，在典礼上皇帝要按封地的方位，赐予一种色土，表示授给其统治一方的权力。因此社稷坛上的五色土，象征东西南北中国土的完整统一。

黄色之所以能居于诸色之上，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起源有关，比如中华民族的摇篮为

“黄河”，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为“黄土高原”，即《易经》中所说的“天玄而地黄”，中国人的肤色为“黄皮肤”，中国的人文初祖为“黄帝”。因此黄色代表尊贵而且位居中央。然而黄色却在现代中国遭遇了被轻视、甚至被“污名化”的命运。其命运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是被作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皇权的色彩被中国革命者们抛弃；在文化方面则是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阶层抛弃。以今天在普通人的词汇里，本来是尊贵象征的黄色竟然成了色情的代名词，比如黄色下流、黄色小报、很黄很暴力、“扫黄”等。其实色情与黄色相联系并非出自中国，而是源自英美等国。1894年，英国创刊了一家杂志，名为《黄杂志》，一批有世纪末文艺倾向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画家等，围绕该杂志形成一个被称为“颓废派”的文艺集团。他们的作品，有时带有一点色情意味。同时，当时的法国有许多廉价爱情小说是黄封面的，这种小说被称为“黄色书”。黄杂志和黄色书，都使“黄色”与性、色情、恶俗等等概念发生了联系。而美国报业与“黄色”发生联系，则是因《世界报》和《日报》为了发行量而展开疯狂竞争。当时两报广泛采用通栏大字标题、彩色连环画、大量图片等等手法，竭力迎合读者。这段时期被称为“黄色新闻”时期。因而在西方，“黄色”就意味着色情、媚俗，下流。黄色在英美历史传统中地位不高，所以两国国旗中都没有黄色（两国国旗都是红白蓝三色，英国红色米字、蓝底白边；美国是蓝色星星、红白相间条纹），因此，西方人对于黄色的贬低和蔑视是并不奇怪的。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英美，黄色在历史传统中的地位一直较高。即使在推翻了清王朝以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一度是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统一中国大陆各省，才正式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统一用于全国各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中国的国旗是红黄两色（黄星红底），而在几乎所有谈中国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文章中，都只提国旗的红色，却很少有提到黄色的，黄色这种颜色似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正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强势英美文化的影响而失去了

自己与历史的联系。在我们逐渐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可以纠正一点对黄色的偏见、恢复一点对黄色的传统评价呢？

四、红色的象征：共产主义和革命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既有过红色代表某个王朝，也有其他色彩代表某个王朝，以红色代表现代中国则无疑与百年来中国历史有关，因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主流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而代表革命与胜利的红色也就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代表色，在这一点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并无不同^⑩。由于与时代的主流思潮——革命联系在一起，于是红色自然成为正义象征与信仰，成为最具力量和权威地位的色彩^⑪。

红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色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1792年，雅各宾党人把红色旗帜解释为自由的旗帜。1834年，里昂的缫丝工人起义，红色的自由旗帜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1850年《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发表在宪章派领导人乔·哈尼出版的《红色共产党人》杂志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国旗图案为红旗，左上角有金色的五角星、镰刀和铁锤图案。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信仰也逐步传入到中国，对于当时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人而言，它无疑具有榜样的感召力和示范性。于是，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传播到了中国。红色逐渐成为了象征革命和进步的颜色。中国共产党称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红军”就是典型的表现。“红军”的称呼最早见于广州起义部队。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领导机关发布的《红旗号外》中，就宣布要组织工农红军。但起义失败后，部队并未使用红军称号，而是称自己为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后，才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苏维埃的区域内建立红军”的指示，将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名为红军^⑫。从此，“红军”正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称号，“红”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象征。红色代表着政权与共产主义信仰，成

为正义的化身，同时也代表革命者为人民谋幸福的流血牺牲，因此被赋予了革命、进步、胜利等积极的、政治性的意义，成为使用极为频繁并富有政治寓意的色彩词汇，如“红军”、“红色政权”、“红旗”、“红色江山”、“红色教育”、“红色接班人”、“又红又专”、“红头文件”等。

正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红色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得到了大大强化，成为所有色彩中最尊贵的颜色。不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颜色是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颜色是红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颜色是红色、就连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队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团旗的颜色都是红色，中国大陆的孩子从小开始，对红色的认知便附上了政治属性。红色代表革命的观念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变得愈加牢不可破。如“红色接班人”等于“革命接班人”，“革命后代”等于“红色后代”等。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也与“好”、“优秀”等褒奖性的词语与行为结合在一起，在幼儿园里，表现好的孩子会得到小红花，参军入伍会胸佩大红花，通报优秀成绩的光荣榜是大红色的，用于表彰的喜报、光荣退休的退休证书都是大红色的。经过几代人的强化认知，使得许多人从潜意识里认可了对红色的价值判断，他们以为自己对红色的喜爱是天生的，殊不知这种喜爱是被灌输的，是由于红色在社会活动中无数次被有意无意地强调与使用而形成的。由于红色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使用的色彩，当政治一旦进入某个特定时期时，红色也就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流色彩，而带给人们特定的时代记忆，如“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红海洋”、“红色歌曲”、“祖国山河一片红”等。

而除了红色之外的其他四种色彩则失去了“国色”的地位。黑色与罪恶相联系，成了犯罪的代名词，比如黑帮、黑社会、内幕很黑、“打黑”等，于是黑色成为邪恶的色彩。白色由于与国民党相联系，如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为“白区”，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称为“白军”或“白匪”甚至蔑称“白狗子”。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被称为“白色恐怖”，于是在革命的语境中，白色也退出了主流色调。只有绿色，向来不与政治挂钩，反而在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加

强，成为自然、环境、健康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崇尚的、喜爱的、提倡的色彩，而西方的绿色和平组织、绿党等也都以绿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由此看来，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绿色是具有上升空间，并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世界与中国主流色的色彩。综上所述，正是政治原因导致红色在当代中国地位的确立，并最终产生“中国红”的说法。

五、“中国红”：国家意识与时尚潮流

虽然红色早就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也一度成为代表某个朝代的色彩，并在近几十年中成为广泛使用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却鲜见“中国红”的说法，将红色与中国相联结，表现了90年代以来色彩领域国家意识的上升与强化。

如前所述，红色对于中国民俗来说意味着喜庆，对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意味着革命。但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信仰不再时髦，革命意识大为消退，“告别革命”不仅是知识界对这一思潮的宣告，也是执政者对于某种传统说法的放弃^⑬。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国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开始上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得到了强化，而对官方来说，新的时代也需要有一种精神来凝聚全体国民，于是从80年代的“振兴中华”到90年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爱国主义成为时代举国一致的主流意识。同时民族主义意识也因官方的鼓励和支持而得到了强化^⑭。这样一种时代潮流在形象表现上，必然要寻求能够代表其内在意义的色彩符号，在中国传统的五种色彩中，红色因其民俗基础和革命传统自然便成为了代表90年代以来中国的色彩符号。因此，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红色屡屡在重大场合被使用，同时被冠以“中国红”的说法。

2001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APEC峰会上，20位国家领导人集体穿着大红色和宝蓝色的中式对襟唐装亮相（其中江泽民主席穿大红唐装、布什总统穿宝蓝唐装）。这一情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立即传遍全球。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用特殊红釉“中国帝王红”烧结成“中

国红”瓷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会议的48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这种“红而雅、艳而美、亮而柔”的瓷器，一派吉祥喜庆和富丽堂皇，传达出殿堂之器的意味。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红色作为中国展示给世界的主色调，北京奥运会会徽叫做“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主体基准色是红色，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的五个福娃，被特意突出的是红色福娃。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服装以凤纹、祥云图案和中国红为主要创作元素，“鸟巢”的设计中，内部的主色调是传统的“中国红”。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外墙是由7种红色组合而成，能在白昼不同阳光折射和夜间灯光投射及不同视觉高度等条件下，形成统一的具有沉稳、经典视觉效果的红色；四个核心筒则采用另一种红色；建筑内侧则由另外三种红色组成。正是通过这些国家级的、或以国家名义参与的盛典，“中国红”不仅让外国人印象深刻，也赢得了中国民众普遍一致的认可。

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光照下，红色是最容易被视觉收到的色彩，冲击波最强，有力、强烈。红色最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兴奋、激动、紧张，同时给视觉以迫近感和扩张感。“能够产生出一种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和努力进取的态度^⑮”这正符合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进取、成功。因而会成为当代国人偏爱的色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吉祥喜庆、成功兴旺的象征。逢年过节，人们拜访亲朋好友的礼品多以红色作为包装的首选，就是因为红色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红红火火，兴旺发达幸福生活的期待和渴望，因而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广泛接受的幸运色^⑯。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的存在，则造就了商品见“红”就热销的景象，用业界俗语说，就是“品牌见红就不败”。因此国内设计界已经有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红”作为一种时尚元素和文化符号，在商品设计中具有作为品牌标识的巨大价值和特殊魔力。

近年来，对红色的喜爱也随着国人跨出国门的脚步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传播，除了过去海外华人在过年时候的舞龙舞狮，春联鞭炮等等民俗中使用红色外，现在的海外华人更多地进入了国外高层次的商业经营和文化活动，在近年来海外许多有中国人参与、开办的企业和活动中，在以中国、中国传统或中国文化名义出现的场合，几

乎都有红色参与其中，比如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的海报是大红底色，在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中餐馆，门面和招牌往往是红色的，在俄罗斯，凡是中国餐馆门口都挂有红灯笼。正如许多国外媒体或文章在谈到当代中国时，都普遍使用过“红色中国”的说法。在国际上红唐装、红灯笼、红色的中国结等都成为了描绘、指代、象征中国的文化符号，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红色之所以具有精神和情感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这种集体心理共识不仅源于传统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色彩经验积累，也源于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色彩对于当代政治的和革命运动的标志意义，更是由于官方爱国主义的提倡和民众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于是从原始先民的尚红心理到民间习俗中的尚红审美再到作为政治符号的红色话语惯性，心理、历史传统与政治属性三者达成了高度的契合。这种契合使得红色成为中华民族意识和情感的载体，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红”，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全球化时代和图像时代中国的定位与标识，同时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

注释

①参见：邹文兵 吴卫《“品牌见红就不败”——论“中国红”在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运用》一文。

②参见《中国馆“上妆”学问多——色彩专家揭秘“中国红”》，2009年06月08日《世博进行时》。

③（德）爱娃·海勒著，吴彤译：《色彩的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④据说远古时代深山老林有一种怪兽叫做“年”，每隔三百六十五天就出来吃人，天黑之后进村，天亮后返回山林，每当它出来后，人们就人心惶惶，将这天视作一个吉凶未卜的关口，称之为“年关”。后来人们发现“年”害怕见红、火、怕听到响声。于是每到这天，家家户户贴红纸、挂红灯、并燃放爆竹，以此来驱逐年兽。

⑤清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妇女》引《金陵杂志》：“传红，俗谓之下定。男宅婚既合，由双冰人封致女宅，女家用泥金红全柬，书年庚八字，交冰人，俗称大宾，送男宅。”

⑥唐李复言《续玄怪录》卷四《定婚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韦固有一次夜行遇见一老者，老者自称掌管天下婚姻之事。并说他有一根红线，专系夫妻之足。于是后世有了月下老人牵红线的说法。

⑦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中，将红色作为情欲甚至赤裸裸性欲的象征，虽然与中国传统中人们对红色的认知略有不同，但也未违反中国民间对红色象征的基本认知，因为情欲和性欲正是由男女情感而来，只是张艺谋将其转化成了另一种意义。

⑧在思想上，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五行”学说是战国时代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按照五行说，自然中所有物质都可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五种元素既相生亦相克，即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邹衍用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黄帝为土，夏朝为木，商朝为金，周朝为火。这五种元素又分别对应五种色彩，即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

⑨不过，红色也一直与权力有关。从封建社会皇帝的“朱批”到现代的“红头文件”和公章的印泥都必须用红色，都充分表明红色与权力的关系。

⑩在国民党主导的政治语汇中，国民党也将自己看成是革命党，如国民党尊奉的“总理遗训”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国民党领导的武装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华民国国旗的底色是红色，称为“青天白日满地红”。

⑪在当代国际领域里，红色也一直被视为革命的颜色，象征推翻现有的秩序。国外学者指出，在当代欧洲，至今“所有的左翼政党都采用红色作为代表色，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保守党则选择蓝色。”

⑫1928年5月25日，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51号令——军事工作大纲》明确提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革命（军）的名称。”6月4日，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信中正式指示第四军：“关于你们的部队，你们可以正式改名为红军。”

⑬如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中共已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这一说法表明了“革命”一词正在退出主流话语。

⑭《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即是证明。

⑮（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69页。

⑯在红表示“好”这一点上，中文与俄语似乎是共同的，俄语中红色和美丽、好、珍贵同属一个词族，象征美丽、吉祥和喜庆。如莫斯科的红场在俄语中也是“美丽的广场”，红军在俄语中即是“雄壮的军队”。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中国文化符号新体系建设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ZS157。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50901。

作者单位 上海戏剧学院